



「當前我與西太平洋國家之關係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國際組



一、時 間：民國七十四年十月二日下午一時四十分至四時四十分

二、地 點：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二樓會議室

三、主 席：邵主任玉銘

沈召集人劍虹

四、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一)邀請出席人員：

- 江炳倫先生
- 宋越倫先生
- 李登科先生
- 李國雄先生
- 林秋山先生
- 高崇雲先生
- 許懷聰先生
- 陳 驥先生
- 羅石圃先生

(二)本中心出席人員：

- 王建勛先生
- 朱松柏先生
- 吳祖田先生
- 金家鎮先生
- 陳儔美女士
- 陳鴻瑜先生
- 彭慧鸞女士
- 張和蘊先生
- 張隆義先生
- 張耀秋先生
- 劉志攻先生
- 態自健先生

「當前我與西太平洋國家之關係座談會」紀要

五、主席報告：

本中心一直有一不成文之規定，即由各研究組每年分別舉辦一至兩次學術座談會，邀請中心外的學者專家參加，就座談主題提供高見。今天座談會的主題是我國與西太平洋國家之關係，在座各位都是研究亞太事務的權威，希望能借重各位專家的指教，提昇本中心的研究水準，在此謹代表中心向各位表示由衷的歡迎與誠摯的謝意。由於此次會議由國際組承辦，以下就請國際組召集人沈大使主持。

六、引言人報告

羅石圃先生：我國與東南亞之關係：

我國與東南亞國家不但地緣關係唇齒相依，人文關係更是源遠流長；且因華僑華人佔東南亞全人口十分之一，力量雄厚，絕大多數心向自由祖國。故自中共竊據大陸以來，東南亞國家雖先後與我斷交而轉向北平，但仍多與我保持實質關係。

當前東南亞國家，除了已經赤化的印支三邦及採鎖關政策的緬甸而外，其他各國均與我實質關係與年俱增。就我與「東協」六國一九八四年一月到十一月為止的進出口貿易數字而言：對汶萊——我出口總值為一千一百七十九萬三千美元，進口：四千五百九十八萬七千美元；對印尼——出口：三億二千三百二十四萬三千美元，進口：四億零四百九十四萬二千美元；對大馬——出口：二億一千一百四十八萬二千美元，進口：四億九千七百九十一萬五千美元；菲律賓——出口：一億七千八百七十七萬三千美元，進口：一億二千四百四十五萬四千美元；對新加坡——出口：八億一千三百三十八萬二千美元；進口：二億四千九百一十九萬五千美元；對泰國——出口：二億二千八百零八萬二千美元，進口：一億二千五百三十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

就文化體育等交流的情況而言：所有國際田徑球類比賽，無論是在我國或「東協」各國舉行，都仍然是相互邀請共同參加。我新聞傳播機構在國外所派遣的記者，亦照樣在各國採訪，受訪者亦多有在朝的官員。他如由我僑委會所輔導的僑報，如曼谷《世界日報》，更未因斷交而阻礙發行，雖一度被泰政府禁止使用中華民國年號，惟經我方向其來訪之內政部長提出異議後，即仍恢復如初。其次是「東協」國家在我國的留學生總數，共計六千餘人，大馬即佔三分之一，印尼亦有一千人左右。這些被我國視為僑生的學生，在各該國由於以出生地判別國籍，則都被視為來華的留學生。在堅持「國家化」的「東協」國家，其所以准許如此眾多的學生來華留學，顯然是鑒於我國經技發展成績輝煌，讓他們可以吸收先進技術新知。

此外，由於這些國家當政者，雖因情勢所迫不得不與中共建交，但他們並未忽略中共赤化其國家的野心，且更處處防堵北平利用華人為其第五縱隊，尤其引誘華人青年赴大陸求學，作為各該國共黨武鬥奪權的先鋒。讓華裔青年來臺灣留學，除接受科技新知而外，更可於回國後作為赤浪中的反共砥柱。所以近年來，大馬共有兩萬多名來臺留學生，於回馬後在各行業中服務，成就都相當可觀。

我與東南亞國家實質關係的進展，更可列舉事實，加以說明。例如在菲律賓，七十三年八月，菲總統親自批准我「太平洋文經中心」人員具有國際組織官員外交特權。當時菲外次卡斯楚接見我公聯合報記者訪問時，指明菲國重視與華人關係，及承認臺灣對菲戰略地位最為重要，且表明海域重疊問題，可以擱置不談。菲代參謀總長兼警監羅慕斯，向我記者表明：他於一九七五年來臺訪問，對我經建進步留有深刻印象；在「國際刑警組織」集會時，他與「東協」各國代表與我代表接觸頻繁，並極盼他主持的菲「退除軍人投資發展公司」與我退輔會在呂宋卡加揚省及岷答那峨的合作計劃，加速實施。

其次是我與印尼實質關係的進展，雖由四年前，我行政院孫院長應印尼副總統馬力克邀請率團訪雅加達，始向國內外曝光，但實際上兩國經技合作一直是非常密切，成果輝煌。在工業方面，諸如石油探勘及石化工業、民生日用品和外銷工業品的製造，印尼都得到我方的協力推展；在農業方面，包括基本建設、區域發展與人口徙置，我農業技術團在印尼的工作，無論在泗水、日惹，都贏得了朝野的好評，使當地農民收入增加了八至十倍。印尼所以由米糧不足，一變而成為有餘米外銷，多半得力於我農技團的指導協助改進使然，因而又增加了第三個團在西爪哇工作。

我榮工處在印尼的築路與開發森林，由於貢獻超凡，以致印尼退輔會多向我退輔會學習，俾便將退除役官兵變為建設人才。我石油公司在印尼設立的「海外石油化工投資公司」，除協助印尼石油公司探勘開發而外，並協助增產液化石油氣。我國在今年二月，曾由工商界組成「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印尼委員會」，並推中信公司辜濂松，及中油、榮工處等負責人策劃推進，與先已成立的「印尼工商總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共同策進兩國的經貿關係。從印尼國營水泥公司有我技術人員二百多人，即可窺知兩國實質關係的開展並非偶然。

此外，大馬總理馬哈迪於上年十一月過境我中正機場時，曾特別邀約我行政院俞院長晤談，交換加強雙邊關係的意見。從而大馬准許我駐馬「貿易旅遊中心」擴大編制，兩國人員來往頻繁，大馬聯邦及州政府紛紛派員來臺考察及接洽貿易投資，馬政府並已核准了我五十個工廠整廠輸馬。從以上三國與我關係增進的情形，即可窺見「東協」國家始終與我敦睦。

張隆義先生：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關係

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日斷交後，我國以「亞東關係協會」，日本以「交流協會」，作為彼此溝通的管道，發展實質的關係。十多年來，在雙方的努力之下，使中日間的實質關係，不僅依然存續，且有繼續增長的趨勢。

中日斷交後，日本的國會議員或文化、經濟界人士到中華民國訪問的逐年增加。例如由自民黨國會議員所組成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會員超過二百人），為加強與我國的連繫與促進親善關係，每年的雙十國慶紀念日都組團來華訪問，在野的民社黨亦成立「日華懇談會」，每年組織國慶節祝賀團來訪。去年「新自由俱樂部」的國會議員，亦首次組團來華訪問，與各界交換意見。在文化界則有東京日華文化協會、福岡日華文化協會；在中共問題研究方面，有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會；在經濟界有東亞經

濟人會議、臺資會、日華觀光交流協會；科技方面有東亞科學技術協力協會等組織；促進中日文化、學術、經濟、科技等的交流。此外，亞東親善協會及設在日本全國各地的日華親善協會，共有三十二個團體，也都在促進雙方民間親善活動。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的黨、政、企業界人士受邀訪問日本也是越來越多，接觸的層次越來越高。又中華民國留日學生人數，從一九七二年的三千八百多人，激增到現在的八千多人，在世界各國留日學生中佔第一位。

根據官方的統計，一九七三年訪華的日本旅客為四十三萬七千人，一九七九年則達到六十九萬三千人，一九八〇年以後受到世界不景氣的影響，略為減少，惟一九八四年仍超過六十萬人，居外籍遊客人數的首位。除美國外，臺灣是日本人到海外旅行人數最多的地區。另一方面，由中華民國到日本的旅客，一九七二年雖僅為四萬八千人，一九七九年一月我國開放國民海外觀光後，前往日本的人數急速增加，一九八四年已達到三十五萬二千人，居旅日外國總人數的第二位，僅次於美國。

在投資與技術合作方面，中華民國政治安定，並有完善的保障及獎勵投資法規，形成優良的投資環境，而為外人投資最理想之地區，因此頗能吸引日本企業家轉向臺灣投資。從一九五二到一九八四年，日本企業來華投資累計達八六八件，總金額為九億八千五百萬美元。去年一年日本企業對中華民國的投資，經核准的就有二十八件，金額為一億一千四百萬美元，佔外人對華投資總額的二二%；同年日本對中華民國所提供的技術合作達九十九件，佔外國所提供的技術合作總數的五八·九%。為提高工業水準，發展精密工業，我國呼籲日本業者，尤其是尖端科技工業部門的企業多多投資，進行技術合作。

在貿易方面，中華民國佔日本輸出市場的第五位，而日本則為中華民國的第一大進口國家，也是第二大出口市場，兩國貿易關係極為密切。一九八四年中華民國的對日輸出為三十一億八千六百萬美元，比前年增加二八%，自日輸入為六十四億四千二百萬美元，比前年增加一五%，貿易入超達三十二億五千六百萬美元。我國對日貿易入超，在一九七三年僅為五億多美元，但以後逐年增加，一九八一年更高達三十四億四千九百多萬美元，亦即九年之間增加了六倍多。此種貿易不平衡的急速擴大，已成為中華民國對日貿易之嚴重問題。

由於中華民國的努力與經濟上的成就，使中日兩國實質關係逐漸加強，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中日之間仍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以當前的中日關係來看，首先亟待解決的問題，還是經濟問題，其中包括了經年累月的對日貿易逆差，以及日本對我之技術轉移問題。

我國對日貿易赤字，從一九六五到一九八四年已累積達到二百八十五億美元。過去我國一再要求改善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應，只得於一九八二年二月斷然宣佈禁止日本一千五百三十三種消費品與大型汽車及其零件等貨品進口。於是日本才在一九八二年七月派自民黨國際經濟對策特別調查會江崎真澄會長率團訪華，協議謀求改善貿易的不平衡。一九八三年九月東京瓦斯公司會長安西浩帶領訪華採購團前來，購買總額達十一億三千萬美元的商品。

中日兩國由於產業結構不同，某種程度的貿易不平衡固然無可避免，但是雙方必須以互惠平等為主要原則。日本在對外貿易擁有大量出超的情形下，仍採取高度保護政策及不合理的「非關稅障礙」，無怪乎引起世界各國的反感。最近日本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宣佈市場開放的「行動計劃」，主要係針對歐美各國的要求，對我國一貫所要求的農產品，尤其是茶葉及冷凍食品的關稅降低，並沒有很大的幫助。事實上我國農產品要進入日本市場，所遭遇到的關稅、非關稅，成文或不成文的貿易障礙，遠過於其他國家，今天我們仍須不斷地促請日本改善。在技術移轉方面，也希望日本能夠拿出誠意，提高合作的層次，進行國際分工與合作，以促進貿易來改善貿易不平衡的情形，則雙方均將獲得利益。

其次，日本在中華民國的代表機構或工商業者都受到我國優厚的禮遇，而日本却沒有給予我國相對的待遇和重視，這也急待改善。日本政府一向對中共的反應過度敏感，而忽視現實的中日關係。例如日本外務省所發行的「外交藍皮書」中的各種統計表中，連沒有外交關係的北韓或香港地區都予列入，而在許多地方却漏掉有關中華民國的資料。日本的新聞界也沒有負起反應現實情況的責任。美國的大報社在臺北和北平都有特派員，而日本除了公產經新聞之外，在臺北都沒有特派員。這顯然是為討好中共，怕觸怒中共，而不能確保新聞報導的自由。例如今年二月我國派駐日本十二年的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馬樹禮先生奉調回國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務，這種只要打個電話到亞東關係協會就可以採訪到的消息，但日本各報，除了公產經新聞之外，都透過外電甚至新華社加以報導，真是荒唐至極。

日本對中國大陸的市場一直抱著幻想，雖曾在一九八〇年中共一連串的毀約聲中，受到很大的挫折，但仍然沒有完全清醒過來。最近中共的所謂經濟開放政策，又使日本重新燃起美夢。日本以為拉攏中共可以對抗蘇聯在亞洲的勢力，對安定亞洲的局勢有所幫助，但是從日本被中共納入反霸行列之後，蘇聯在亞洲勢力的發展，可以看出日本的期待落空。而且中共的世界戰略一般受意識形態所決定，在戰略上與蘇聯對抗的潮流已成過去，最近中共領導階層已逐漸脫離將蘇聯看為戰略敵人的立場，而進行與蘇聯和解，使日本感到不安。

中華民國與美日同屬民主自由國家，在經濟上更是美日兩國的重要夥伴，在戰略上控制重要據點，防衛太平洋上的門戶，沒有臺灣的存在，日本的安全將會受到嚴重的威脅。我們切望日本勿對中共存著幻想，尤其不要再對中共提供經濟及科技援助，以免中共坐大，而威脅到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更不要為討好中共而傷害到中華民國。日本應該站在維護自由民主主義的立場與長遠的利益上，重新調整對中華民國的政策，進一步提升交流的管道。

朱松柏先生：中韓關係的現況與展望

中韓兩國不僅在地理上、歷史上或文化上具有傳統密切的友好關係，特別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兩國人民都遭到國土分裂、親人離散的痛苦，今天兩國又面對共同的敵人，和平統一祖國的目標完全一致，因此在過去三十多年間，兩國均能在既有的良

好基礎上，繼續加強政治、經濟、貿易、體育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惟自一九七三年六月韓國發表「門戶開放政策」後，改變過去親西方與堅決反共的外交立場，積極尋求與共黨國家改善關係，致使中韓關係面臨嚴重的考驗。

進入八〇年代後，中共對南韓的態度開始有了很大的轉變，中共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並從西方國家引進科技與資金，以便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加上美、日兩國的從中穿針引線，南韓與中共的關係總算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一九八三年五月發生六義士奪機事件，中共派遣民航局長沈國園往漢城交涉歸還人機事宜，造成南韓與中共三十多年來首次的官方接觸。由於奪機事件的順利解決，中共也給予南韓善意的回報，同意與南韓展開體育、學術文化等非政治性的交流，而且雙方間接貿易也急速增加。

一九八三年六月韓國前外長李範錫更指出：「八〇年代韓國外交最重要的目標是防止朝鮮半島的戰爭發生，今後韓國外交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是如何製造有利的外交環境，實現與蘇聯、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北方政策」。因此近年來韓國政府當局一直希望透過體育、學術文化及經濟貿易交流的機會，改善與中共在政治外交方面的關係。尤其是在經濟貿易方面，韓國政府當局也野心勃勃試圖在中國大陸市場分得一杯羹，不僅著眼於中國大陸豐富而廉價的原料，同時也迷幻於十億人口的龐大消費市場。為此韓國政府積極鼓勵企業界與中共貿易，並致力於改變間接貿易為直接貿易，近年來韓國各大企業紛紛在香港設立分公司（據傳已有四十多家），作為進攻大陸市場的前哨基地。去年雙方貿易包括直接貿易在內已高達八億美元，今年可望超過此一數目。

中韓關係近年來一再受到韓國企圖改善與中共關係的影響，比如一九八三年五月的六義士奪機事件，一九八四年四月的亞青杯事件與今年三月間的魚雷快艇事件，都對中韓傳統友好關係造成很大的衝擊。

中韓雙邊貿易從一九八一年以來就一路呈現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兩國工業結構與出口產品雷同，對外貿易市場競爭激烈。此外，八〇年代韓國標榜「北方政策」，積極尋求與蘇聯、中共發展關係，希望藉此獲得經濟貿易利益。

根據統計，一九八一年中韓雙邊貿易額達到五億八千一百萬美元，而後即年年下降，一九八二年下降26%為四億三千一百萬美元，一九八三年下降10%為三億八千七百萬美元，一九八四年略為回升達四億七千四百萬美元。去年增加的原因是韓國對我輸入激增的結果，雖然如此，去年我國對韓貿易僅佔全年貿易總額的百分之零點九（五百二十四億一千五百萬），比率很小。我國自韓輸入與輸出的十大產品包括農產品、橡膠塑膠產品、運輸工具、電機電器、紡織品、基本金屬、化學材料、加工食品、化學製品、非金屬礦產品及機械等。

自從一九六六年起，中韓雙方每年定期輪流在臺北與漢城召開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第十八屆會議於今年三月間在臺北舉行，雙方達成海運及金融合作、研究海外投資合作等多項協議，並決定合作對日交涉擴大兩國產品，相互採購對方產品，以減少對日貿易逆差等。事實上中韓經濟合作會議進行多年以來，由於韓方合作誠意的缺乏，已每下愈況。而我國對中韓事務的處理，又

常偏重於中韓傳統友誼和現實外交環境的諸多考慮，堅守一貫隱忍的原則，以期委屈求全。譬如過去三、四年間我國先後進口韓國汽車已達數千輛，而韓方始終未實現進口我國汽車零件的承諾；又韓國在一九七八年實施「放棄承運簽證制度」，凡未與韓國簽訂海運互惠協定的國家，其船舶無法在韓靠岸攬貨，我亟欲與韓方簽訂互惠辦法，韓方則一再拖延，其後雖然航空與海運方面都達成某種協議，仍是以遷就韓國利益為先。因此從近年來中韓經濟合作會議的內容看，其政治象徵意義實遠大於經濟實質利益。

中韓兩國在學術文化交流方向，透過藝術品展覽，各種運動團體、學校、社會團體之間締結姊妹關係等活動，加強了民間的友好關係。在韓國政府當局積極推展改善與中共關係的政策下，近年來韓國各大學如雨後春筍紛紛設立中文系及中國問題研究所，致力於中國問題人才之培養，因此學習中文，研究中國問題，在韓國已蔚成一股熱潮；但是韓國各大學師資與教材缺乏，因而紛紛派員來華接洽合作事宜。目前國內各大學幾乎都與韓國各著名學校建立姊妹關係，雙方除了定期交換學術性刊物外，也交換學生與教授。單就目前韓國留華學生人數而言，已超過一千餘人，佔外國留華學生的首位，每年寒暑假亦有不少韓國學生前來我國學習語文。

此外，政大國研中心與韓國西江大學、中韓文化基金會及韓中教育協會、中華民國文藝協會與韓國作家協會等民間組織，每年定期在臺北與漢城舉行學術會議，對增進中韓民間友誼與了解也有很大的貢獻。

展望中韓關係的未來發展，仍將受到韓國與中共關係變化的影響。南韓能否與中共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主要還是決定於中共的意圖以及北韓的外交能力和態度。就目前的情況而言：

(一) 韓國政府當局一再表示將繼續與我國維持政治、經濟、貿易、文化等各方面的傳統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基於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考慮，仍將努力推動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二) 改善與中共現存之關係，最後建立正常之外交關係，顯然已經成為韓國政府當局的既定政策，在非政治性交流方面中共的大門已經打開，韓國今後要努力的是如何促成雙方官方關係的改善。

(三) 雖然中共基於現實的需要而同意與韓國展開非政治性的接觸，不過中共當前的朝鮮半島政策，仍然堅持「一個韓國」的原則，一如它堅持「一個中國」的情況一樣，因此在短期內中共不可能接受「兩個韓國」的概念，也不可能犧牲北韓承認南韓。

(四) 中共是否同意與韓國建交也要看北韓的態度如何而定，如果北韓與中共反臉成仇，倒向蘇聯一邊，就像目前越南的情況一樣，中共為了抵制蘇聯的威脅，或許會被迫與南韓建交，不過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也不大。過去三十多年來金日成一直在中蘇共同採取等距離外交，以便獲得左右逢源之利，因此與任何一方決裂都不符合它的現實利益。

總而言之，在短期內中共仍然不可能拋棄北韓轉而承認南韓，因此吾人對中韓關係的未來發展尚可抱持樂觀的態度。今後繼

續加強與韓國在政治、經濟、學術、文化等全面的關係，仍然是我國朝野所應努力的方向。此外，我政府當局似可考慮比照與東歐各國的間接貿易，展開與北韓非政治性的接觸，在不違反基本國策的原則下，作最大的彈性運用。最後我外交當局也應慎防有一天南韓可能步美、日後塵，不惜與我斷交而承認中共，並早作未雨綢繆之計，藉使我國在外交上所受的損害減到最低的程度。

陳鴻瑜先生：我國與太平洋盆地共同體之關係

有關太平洋盆地合作的概念，最早見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日本一橋大學小島清教授所倡議的由美、日、加、澳、紐五個工業國家建立一個「太平洋自由貿易區」。一九六七年，美、加、日、澳、紐等五國民間企業公司組成了「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的實體組織。其他主張還有德瑞士戴爾（Peter Drysdale）和派屈克（Hugh Patrick）倡議的「太平洋貿易暨發展組織」；米勒（J.D.B. Miller）倡議的「太平洋經濟社會」；治野橫山倡議的「太平洋經濟盆地」。

亞太地區各國領袖亦對成立太平洋盆地共同體的概念發生興趣，如紐西蘭總理科克（Norman Kirk）在一九七三年建議成立一個非正式和非軍事性的太平洋區域團體；澳洲總理佛瑞塞（Malcolm Fraser）在一九七九年向國會報告稱，太平洋盆地概念具有潛在的益處，隨後並由澳洲外交部草擬一份建立「太平洋經濟社會」的報告；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在一九八〇年建議成立類似「非洲團結組織」的「亞太論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一九八〇年三月提出「環太平洋連帶構想」；韓國總統金斗煥在一九八二年七月建議成立太平洋區國家高峰會議。

目前在亞太地區的區域性組織與會議有：東南亞國家協會、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社會委員會（總部設在曼谷）、美澳紐聯邦組織、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太平洋論壇（設在夏威夷）、南太平洋論壇、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而我國只參加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和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純由民間商業團體組成，我國工商協進會在一九六八年加入該會，至一九八四年五月始取得正式會員國資格。該會準備於一九八九年在我國召開年會。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的性質與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不同，出席人員包括政府官員、工商界和學者，所以具有半官方的政治色彩，也比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更受到重視。惟我國一直未能成為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的正式會員。該會於一九八〇年九月在澳洲舉行第一屆會議，我國未獲邀出席。一九八二年六月在曼谷召開第二屆會議，我國代表只以貴賓身份應邀出席。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印尼召開第三屆會議，我國代表以觀察員身份應邀出席。一九八五年六月，在韓國舉行第四屆會議，儘管我國與韓國有正式外交關係，但我國代表仍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我國是西太平洋地區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而竟然未獲准成為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為主體的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的正式會員國，原因有三。第一，美、加、日、澳、紐及東協諸國與我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不願把敏感的允許我國入會的問題拿來刺激中共。第二，這些國家對於中共在一九七九年採取的開放政策，抱著極大的興趣與幻想。像美、日、澳等國，都主張把太平洋

經濟合作組織變成一個開放的不含意識形態色彩的組織，無疑地是在暗示允許中共入會。第三，最近亞太各國為謀取經濟利益，就相與中共進行直接貿易及其他生產合作，如過去反共態度堅決而且尚未與中共恢復正式外交關係的印尼，在今年七月與中共簽署了一項直接貿易的諒解備忘錄；尚未與中共建交的新加坡，其總理李光耀在今年九月中旬第三次訪問中共（第一次是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是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雙方在貿易、投資和技術方面已進行廣泛的合作；馬來亞和泰國亦加強與中共進行經貿合作。同樣地，美、日、澳等國家亦展開向中共輸出技術的競爭，美國與中共甚至可能在防衛體系的高科技領域進行合作。

假定中共的開放政策再繼續實施十年，則亞太諸國與中共的經貿關係可能更加密切，中共加入太平洋地區經濟組織的時機也將益為成熟，而我國面對中共的競爭，結果不是與中共一起加入該類組織，就是被摒除在外，而成為該地區經濟集團之外的孤立國家。

假如太平洋盆地共同體只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理想，或者只是學者專家的一個談話題材，那麼，我們大可不必耽憂該組織對我們會有些什麼影響。然而，從目前該類組織發展之趨勢來看，我們不得不給予更大的關注，因為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於一九八二年在曼谷召開時，曾決議設立原產品貿易、製造品貿易及投資與技術移轉三個工作小組來推行工作，而原本對太平洋盆地共同體有疑慮的東協國家也在一九八四年舉行的東協外長會上建議成立「東協太平洋合作計畫」——馬來西亞主張先進行人力資源訓練計畫。從長遠觀點來看，太平洋盆地合作組織似乎隱然在形成之中。

根據日本經濟計畫廳之預測，亞太地區的常年經濟增長率在本世紀內將保持百分之四的水平，到公元二千年，這些國家的常年平均增長率可達百分之七。隨著經濟成長，亞太地區的經濟互賴性亦必相對地提高。為使我國在這個經濟互賴性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對於太平洋盆地共同體之理想，我們應主張二項原則：第一，太平洋盆地共同體應是一個非政治、非軍事的經濟組織；第二，太平洋盆地共同體應以實行自由經濟市場的國家和地區為主體。

未來十年，亞太情勢將可能發生一些重大變化，如中共與亞太各國甚至美澳紐加強貿易關係、印尼和新加坡可能相繼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我國產品將面對亞太地區其他新興工業國家之產品的競爭壓力、亞太地區的交通與通訊頻率將增加二、三倍、太平洋區域經濟共同體將出現雛形組織。面對這些變化，我國除了主張上述二項對組織太平洋盆地共同體之原則外，必須加強與亞太國家的雙邊關係。目前我國與日本和韓國每年都舉辦有經濟合作會議，唯獨尚未與東協國家舉行類似的會議。以我國工業化之水準和地理位置來看，我國扮演協調亞太地區南北合作的角色，將是今後十年謀求經濟生存和區域參與的重要途徑。

李國雄先生：

東南亞地區的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從一九六七年起，就已經成立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汶萊於一九八五年加入）。歷經廿年來的運作，這個當初不受國際社會所重視的區域性組織，今日已成為廣受列強或其他區域組織，如

美、英、日及歐洲共同市場所重視的一個政治、經濟機體。在經濟上，過去十多年來，除菲律賓外，各國始終維持百分之八的成長率。在外交上，自一九七九年赤色越南入侵高棉之後，東協成員面臨一個共同敵人的強大壓力及威脅，因此能在聯合國大會中團結一致，成功地展示其集團性的力量，使得高棉橫山林政權始終無法取得聯大的席位。經濟上的活力及外交上的團結力，已使東協集團成為國際社會中一股不能，也不該被忽視的力量。

就地理位置而言，東協位處我國南疆近鄰，控制了整個西太平洋海線安全的孔道。越軍入侵高棉之後，該區更成為美蘇及中共暗中較勁、互相爭奪的地區。在意識形態上，東協各國都不約而同地對內積極反共，對外則採取求生存與自保的彈性外交；此外，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該區的兩千萬華僑，在當地的經濟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政治也有其一定程度的幕後影響力。

綜上所述，東協國家與我國關係之重要性可歸納如下三點：(一)基於各國經濟發展之潛能，及其自然資源之豐富，東協國家可以作為我國增進雙方經濟活動、貿易關係，乃至於以我國臺灣地區的發展經驗，從事實質交流，更進一步發展積極良好關係的重要據點；(二)由於其內部的反共意識形態，及其對安全秩序的重視，我國對東協國家關係的開拓，只要以細心和耐心，並運用靈活之手腕，應屬大有可為；(三)由於華僑深厚的潛在影響力，我們應可在不涉及當地敏感的政治問題之前提下，進一步發揮僑務工作之功能，強化華僑的向心力，藉以增進我國與華僑所在國之實質關係。

加強我國與東協國家之關係，實為刻不容緩之要務。特別是近幾年來，中共在許多官方或非官方的國際機構及會議上，排斥及孤立我國的企圖日益明顯，我國的處境更趨艱難。個人常感覺到，以東協各國對內反共政策之積極，印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對中共不信任的心態之強烈，我們應該可以從官方及非官方的途徑，來爭取東協各國對我國生存與發展目標的認知及道義上的支持。

但是，在雙邊關係的發展上仍有逆流在逐漸形成中。中共近幾年來的經濟改革，已經使得西方各國的政府及新聞界產生一種印象，認為中共領導階層的政治行為已漸趨理性，其內部政治秩序也將跳離過去卅多年來政治權力鬭爭風暴的惡性循環。東協各國對此似乎也有同感，有些甚至認為中共的經濟改革已不再是社會主義的模式，反而具有資本主義的雛型。不巧的是，今年東協各國普遍陷於經濟停滯的困境，它們面對大陸經濟改革後所出現的實質經濟成長——估不論此等成長能否持久成長的代價為何——免不了對大陸十億人口的市場，有著一定程度的期待。

中共的經濟改革，不只引起各國對中共政權本質上認知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當地華僑在心理上所產生的衝擊。他們是否會基於民族主義心理及感情因素，而在海峽兩岸政治認同及效忠上，也逐漸起了變化？應該是我國今後海外僑務上的一大挑戰。其次，對中共大陸貿易市場的需求，也已逐漸起了連鎖反應。八月上旬，中共與印尼簽訂了雙方直接貿易協議，並明白指出，希望直接貿易將是雙方關係全面正常化的前奏。雖然，由於軍方的反對，印尼至少在蘇哈托總統任期於一九八八年屆滿前，尚不可能與

中共建交，但是商人利之所在，是否會有意外出現？是值得我們所關切的。

緊接著直接貿易協定的簽字，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於九月中旬往訪大陸，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也將在本月末裝出發。兩國總理不約而同地都是以貿易市場的開拓為着眼點，而中共對該兩國公民的旅遊限制，也都先後加以適度的放寬。此等現象是否代表某種潮流趨勢？此外，越南入侵高棉後，東協對中共的敵意開始降低；這些情況是否會演成各國搶搭前往中共的巴士，從而形成華僑一窩風回歸或認同大陸的浪潮，在在值得我們注意。

面對東南亞地區內外環境的變遷，我國應該改變目前以全部力量耕耘美國的一頭熱現象，而將東協近鄰視為另一個努力的目的。

第一、印尼的動向，不只關係著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更影響到東協其他成員未來的動態。因此，我們應時時注意印尼政局的發展，多接觸新生代的軍政領導精英。基於軍人對印尼政局的影響力，我們尤應加強與受過西方軍事訓練的年輕軍事將領的接觸。當然，多了解印尼軍政結構為進一步接觸的首要前提。

第二、除印尼之外，其餘東協各國也都將在今後兩、三年內，接受權力交替的考驗。因此，對各階層政經領袖的接觸與邀訪，建立公誼私交，皆屬必要。

第三、華僑社會一向是支持我國政府的主力，但是年老一輩的僑領逐漸凋謝式微，社會結構改變的結果，使年輕一代的僑社精英漸成主流。這一輩年輕僑領在政治態度上是否會傾向理想及自由派的色彩，而使整個僑社變質？皆值得注意。

第四、加強以民間力量促進實質外交的努力。我國工商企業界或其他各式民間團體，可與東協所成立之各種類似社團，進行互訪交流工作，讓當地社會實際瞭解西方傳播媒體所經常提及的臺灣經驗。此等一點一滴的文化、經濟，乃至學術的交流工作，在必要時，就是支持我國的力量泉源。

江炳倫先生：

(一)審視當前實際情況，「東南亞國家協會」國家皆以經濟發展為其首要目標，且皆與我國已有或多或少經貿來往，關係可謂相當密切，要舉辦半官方方式甚至官方經濟會議，或簽訂技術和學術交流協定，當不致有太大困難。如能因此進而發展多邊關係，便可自然提高我國在此區域之地位和影響力。外交部和其他有關單位，正在朝此方向進行，且著有成效。我們希望政府更加注意此區域之重要性，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同時更積極輔助相關民間團體發展與當地團體的親密關係，達到全面外交的目的。

(二)審視個別國家的政情和外交動向之後，個人認為印尼應是我們工作的最主要目標。一年多來，印尼一反「九·卅」政變以來外交低姿態，開始積極主張其獨立外交路線，圖在此區域和國際上扮演一重要角色。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假設和路線是：(1)認為就長期言，中共才是最大的安全威脅。而一個獨立強大的越南，可以成為中共與東協的緩衝，所以印尼對高棉危機另有一種看法

，不願越南因高棉問題而過分受到譴責和挫折。(2)積極發展與蘇聯和東歐經貿關係，藉此給美國一個警告：如果美國過分縱容或依賴中共，忽視東南亞人民的利益和看法，印尼自有另一條路可走。印尼除本身地大物博值得特別注視外，其此一外交立場，從某一角度言，亦非完全與我利益相悖。

東南亞第二個把中共視為最大可能威脅的國家是馬來西亞。瑪哈迪總理自一九八一年就職以來，積極推動自由化的經濟發展政策，成效可觀。其「東望政策」及加強「南—南」技術合作關係的構想，對我皆甚有利。事實上，近幾年來，我國與馬國半官方實質關係和經濟技術合作關係，改善了很多，今後自須在此基礎上繼續擴大。馬國最令人引以為憂之事，是其國內華巫關係的發展。我們對此問題應寄以最大的關注，但在言行態度上必須十分謹慎小心。

菲律賓在地理上與我隔海毗鄰，可謂具有唇亡齒冷的親密關係。不幸其政治不穩，經濟惡化，未來發展如何，無人能把握預測。就政治言，三種可能性皆不能排除：一是馬可仕或其家人繼續掌權，二是反對派民主人士透過選舉接掌政權，三是共軍叛亂奪權成功。在情況未明朗之前，我們於與菲國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之同時，似可考慮透過不同管道，多與其學術界、新聞界和民主人士保持聯繫。

許懷聰先生：

東協國家是我國的近鄰，此非僅指地理上的意義，也含有在區域認同和安全防衛上之雙重意義，我國和東協各國在各種關係上是相互呼應且息息相關的。因此，發展和東協各國的友好關係，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重點之一。

目前我國和東協各國均無正式的外交關係存在，但是基於事實上相互的需要，我國在東協六國均設有代表辦事處；而東協各國除汶萊外，也均在我國設有相對的機構，透過這些機構和各種管道，當可推動我國和東協各國的實質交往，而使彼此間的關係更趨密切與和諧。

由於東協各國和我國的關係特殊，故在實質的交往上，各有「利」與「不利」之因素存在著。我國和東協國家實質關係之進展，最大的阻力來自中共。中共進入聯合國之後，儼然成為東亞之一大強權；加以印支三邦淪陷後，東協各國紛求自保，在外交上，趨向和中共妥協或同謀，盼能部分地借助中共之力量，來平衡蘇越之聯手擴張。東協各國也均以「區域中立」為手段，來維持本地區之安寧，獲致內政的安定，尋求社會的繁榮。在這種形勢下，東協各國與我國在政治層面的交往上，必然顧忌較多，甚至多願保持非正式的、較低層次或不公開的交往，情況可說是相當微妙。

尤有甚者，中共近年來推行四個現代化，局勢對外開放並在部分沿海地區設立經濟特區，使東協各國之政要及商賈亦迷惑於中國大陸之廣大市場及潛在的購買力。因此改善和中共經貿甚至政治關係之說，甚囂塵上，而首先以貿易文化體育旅遊團體之互訪，投石問路，增進好感，再作農產品非石化及林礦等產品之促銷。所以可說，東協各國雖均是反共國家，但對外仍是聯中共或

親中共，為的是謀求政經方面之雙重利益。

但在另一方面，東協各國却也基於其自身的利益，極希望和我國加強實質關係。究其原因有：(一)各國對中共政權，仍深具戒心，因迄今中共未完全放棄對東協各國境內共黨的支持或援助。(二)華人在各國境內經濟實力雄厚，各國若不當引進中共勢力，則易造成社會的不安與騷亂。(三)我國在復興基地上之經建成果、教育建設及民生樂利諸事實，廣為東協各國所欣羨，各國有意以臺灣成功之經驗，作為其社會革新與進步之借鏡。(四)我國曾爭取過各國重要人士訪華，渠等均對我國社會之安和樂利留下有深刻印象；加以學術的交流、資訊的傳播以及旅遊之接觸，各國朝野人士，對海峽兩岸之成就，均可作一客觀之比較，普遍對我國之經濟發展有極大之信心。(五)反共愛國的僑胞對政府之向心力及熱愛，也無形中作了我政府與東協政府間之橋樑，貢獻不小。

實質的關係是雙向的，我國和東協各國的實質關係頗為良好。在政治關係上，透過雙方的代表，常可傳達兩國之訊息，溝通彼此的觀念，目前中共亟謀在重要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上孤立我國，我應積極爭取東協各國支持。另外，我國世盟、亞盟和東協國家反共友人頻繁的交往與連繫，將可打擊中共統戰之陰謀。

在經濟方面，臺灣地區資源較為貧乏，但我們有優越的產業技術和勤奮的人民以及良好的經濟發展；而東協國家則是我國之近鄰，且資源豐富。因此我國常自各國進口各種農工林礦原料，尋求漁業技術合作，協助或共同開發林牧礦區，輸銷農工機械，承建公路、海港及水壩等重大工程。

為了進一步表示我國對東協各國經建協助的誠意，我國也常應各國政府之邀請，派農漁林牧各業技術人員，前往各國考察，並對各國之經建開發做成建議；甚至基於事實上的需要，派遣農耕隊或手工藝隊常駐當地。如自民國六十二年一起，我國和泰國有「泰山山地計劃」之農技合作，十二年來績效良好，深得泰方人士之嘉許。我國在印尼目前亦有二個農技團。以前亦曾多次派遣農業專家赴菲律賓，今年七月中我國亦應菲政府之邀派遣一經技考察團赴菲作三週之考察，並獲菲國高階人士之嘉許。另一方面，東協各國也常派技術人員來華作短期之參觀與技藝研習，以及接受土地改革方面的訓練，東協各國均甚了解我國早期土地改革的成功，使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目前我國桃園土地改革訓練所每年均代訓東協國家較高層次的農村都市土地計劃官員，對東協各國土地的有效利用和分配略盡棉薄之力。

各種文化、體育、青年團體的互訪以及民間社團的活動，對於增進兩國人民之了解及國際睦誼，頗有裨益，同時也可以達成宣慰僑胞之效果。我駐外單位也常配合這些社團的訪問活動及我國的重要節日，在東協各國舉辦各種經建、教育、文化、社會建設成果展覽或文藝、圖書展覽，透過當地輿論的傳播，也能收到相當的效果。

總而言之，目前東協各國由於政治現實的考慮，表現出親匪的態勢，但各國却也能體認出與我國實質關係之必要與利益。在這種不協調的微妙關係下，我們自然要力求突破，並在原有基礎上，透過經貿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經過適切的管道，使東協

各國領袖了解到「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主動和我國改善關係，藉以提陞我國的國際地位，擊潰中共在國際間孤立我國的陰謀。(請參考左下附表資料)

七、自由發言：

宋越倫先生：

自中日斷交以來，兩國關係不絕如縷，不過由於我數十年來的發奮圖強，勵精圖治，尤其在經濟方面的卓越成就，使得日本在有利可圖之情勢下，仍能維持「實質關係」於不墜。只是此種「實質關係」，基礎頗為薄弱，且與大陸情勢的變化互為消長。

戰後中日關係之穩定維持，主要由於先總統 蔣公的高瞻遠矚，及毛匪之倒行逆施。但自中日斷交後，客觀情勢已大有變化，蔣公對日的恩德，已逐漸為日人所淡忘，而毛死後在鄧小平主政之下，運用了一切狡猾迷幻的手法，在國際間造成了一種「類似資本主義」(Semi-Capitalism)的形象，使西歐各國尤其是日本對中共的戒心，一掃而光。十餘年來，對大陸市場滲透最為積極的，首推日本。日本工商資本以及技術人員的進出，(其中一部分為受有訓練的特務人員)目前已由各大省市遍及到西康、西藏、新疆、雲南、貴州、外蒙、廣西等邊緣地區，真可謂無遠弗屆，無孔不入。過去日本未能以武力達成的經濟目標，反而在中共統治之下逐漸達成；尤以中共在卅餘年來的倒退落後的情況下，民族自信心業已喪失殆盡，對於日人高度的技術，無不望洋興嘆，在有形無形之間，形成了一種令人可恥的「卑屈感」！

從整個民族的觀點視之，此乃最值得憂慮之事。可以斷言，將來光復大陸，日本問題的處理，仍將成為我政府的重大難題。

最近數月以來，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情勢日趨明顯，其國防預算突破GNP百分之一的上限，即將成為事實，在所謂一千哩海線(Sea Land)防衛逐漸完成後，其海空軍力終必威脅亞洲各國。以日本的經濟及科技能力，一旦憲法第九條的限制解脫，其成為超級軍事大國，實為指顧間事。過去我對日

附表：近二年我國與東協國家雙邊貿易統計資料

(單位：百萬美元)

年份	項目	印 尼	泰 國	菲 律 賓	馬 來 西 亞	新 加 坡	汶 萊
一九八三	我進口	344.5	74.5	91.2	493.7	167.2	
	我出口	438.8	263.8	245.7	224.3	710.5	
	總值	773.3	338.3	336.9	718.0	877.7	
一九八四	我進口	422.9	139.9	134.3	550.8	267.9	54.6
	我出口	346.2	244.8	190.7	232.0	878.4	12.9
	總值	769.1	384.7	325.0	782.8	1,146.3	67.5

擊潰中共在國際間孤立我國的陰謀

本重整武裝，基於反共的立場，往往在不知不覺間加以鼓勵；然就民族長久的觀點而言，我對日本此項擴軍動向，實有不斷加以監視之必要。

林秋山先生：從蕭天潤返國看中、韓關係

蕭天潤義士於羈留韓國二十餘日後，於九月廿日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地回到自由祖國，其滯韓時間雖較吳榮根、孫天勤義士為長，但較韓國當初宣佈療傷三個月，恢復健康，完成司法程序後，再讓他到第三國之預期時間縮短甚多，因此國人對韓國此舉多感滿意與感激。

但蕭義士得以早日離韓，韓國似乎有其不得已之理由和想法，當時個人適應邀赴韓參加聯合國韓國委員會主辦之世界和平日紀念大會，及「為南、北韓離散家族再會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等活動，茲將所得印象，說明如后：

(1)蕭義士架機闖入韓國領空後，據說在其領空上飛行達三、四十分鐘之久，既未為韓國雷達發現，亦無軍機升空引導，終因情況不明，油料用罄，而迫降墜毀。但韓國國防部在首次發佈之新聞中却說，雷達發現後，軍機升空攔截，引導其飛向羣山機場云云。反對黨對國防部發佈不實消息及其防空系統之疏漏，屢厲指責，並要求國防部長官引咎辭職，因此韓政府希望早日去除「禍根」以消弭爭議。

(2)今夏韓國大學生之示威運動持續不斷，據分析在其宣傳品中發現有容共思想之趨勢，這一情況被認為是政府致力改善其與中共和北韓關係之副產品。且韓政府對中共魚雷快艇事件之處理，曾引起若干批評與指責，使其不得不對蕭義士投奔自由素慎重將事。

(3)飛機墜毀稻田後，蕭義士在農民用卡車送往醫院途中即表達了投奔自由的意願，且很快流傳民間，其投奔自由的意願已無法隱瞞。韓國政府在對蕭義士離境時機的選擇上頗費心機，既不希望被我國宣傳是送給我們的中秋禮品或國慶賀禮，也不希望引起韓國輿論的注意，而九月廿至廿三日是南、北韓分裂四十年後，首次進行南、北韓離散家族故鄉訪問團及藝術公演團正式交互訪問，是韓國數十年來最熱門的新聞之一。稍後有國際田徑邀請賽，中共亦派遣龐大代表團參加，自不宜放人；十月間在漢城舉行世界銀行暨國際貨幣基金會會議，將有各國代表團及工作人員七千人參加，亦有節外生枝之慮。

(4)此舉對韓國國內外既可表示其維護人道的立場，又可向北韓表示中共與南韓關係並不如外界想像之好，而使南北韓關係改善更為順利；同時由於南韓對其與中共所進行之關係改善並不感滿意，此舉亦可對中共表示南韓仍與我維持親密關係，更可以讓我國感覺到韓國够朋友。故韓國政府提前於九月廿日讓蕭義士回到我國，誠不失為一箭數鵰之作法。

目前韓國學生示威與黨爭問題相當嚴重，已妨害到內部團結；經濟問題重重，迄七月底外債已達四五三億美元，連同海外當地貸款已達五一〇億美元；財富分配不均已嚴重影響民心士氣。而韓政府為順利舉辦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對北韓與中共作最

大忍讓，以求突破困局，穩定政權。韓國與中共關係是否能達成預期目標雖難斷言，但改善關係既為韓方既訂目標，在達成目標前，恐難望其回頭。

高崇雲先生：

朱松柏先生之報告，內容詳盡而充實，本人深表敬佩，在座各位學者專家對我與西太平洋國家關係所持看法，本人亦表贊同。個人願以學術研究者之身分表示以下各項意見：

(一)對朝鮮半島問題本質之認識

當前朝鮮半島周邊國家均對南北韓之和談表示積極態度，美國與日本從一九七五年以來不斷推動所謂「南北韓交叉承認」方案，其主旨乃在緩和朝鮮半島緊張情勢；而韓國面臨北韓南侵之威脅，在國際上推行其開放外交，幻想與中俄共接觸，藉以牽制北韓；中共則為達到其四個現代化之目的，亦不願見朝鮮半島緊張情勢之持續，其立場與美、日相同，並在美、日穿針引線之下與韓國作有限度之接觸。北韓與蘇聯則立場較為強硬，惟近日亦有妥協之跡象。

(二)對中韓關係之看法

由於韓國對外政策與我不盡相同，韓國推行開放外交，力謀與共產國家建交，我則堅持不與中共接觸之政策。因此，中韓兩國關係之加強必須在異中求同，亦即從不同立場中求取共同立場。在此基礎上發展兩國之關係，才是兩全之作法。

中韓兩國間關係素來友好，且雙方黨政要人及國會議員互訪頻仍，例如，年來訪華之韓方部長級以上人士即超過五人之多，對加強中韓兩國合作事項裨益良多。

我國為揭發中共之統戰陰謀，除經常密切注意韓國與中共之交流外，個人認為應運用各種途徑，說明我國的嚴正立場，使其了解中韓兩國合則兩利，分則互害之關係，據悉，最近韓方高層領袖對我立場已有相當了解，韓國全斗煥大總統曾於最近接見我駐韓薛大使表示，中韓兩國關係友好密切。我國與韓國在經貿、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合作良好，許多加強合作的方案正在進行當中。

現階段中韓兩國關係偶有微妙情勢出現，此係列強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影響所致，因此，加強東北亞情勢之研究應為當務之急。

陳 驥先生：八〇年代我國戰略地位之再省察

八〇年代開端，我國戰略地位之體認，是基於我國位處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交叉地帶，又以臺灣海峽與巴士海峽共扼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咽喉，在海運線或海線交通安全上，日本幾乎成為我國的函數，在日本、新加坡的海運線上，我國亦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名戰略學家蔣緯國上將說過：「臺灣是日本海上安全地帶兩翼的戰略鎖鑰，由於臺灣控制臺灣海峽與巴士海峽，沒有臺

灣的支援，日本勢必無法從中東與印尼取得能源。」

但自八〇年代中期以還，局勢又有了加速的變化，主要基於下列六大因素：(一)蘇聯東漸的加速；(二)日本勢力南下的加強；(三)中共向太平洋發展的加快；(四)美國勢力西移可能性的加大；(五)南太平洋澳洲勢力北進的加深；(六)南中國海重要性的與日俱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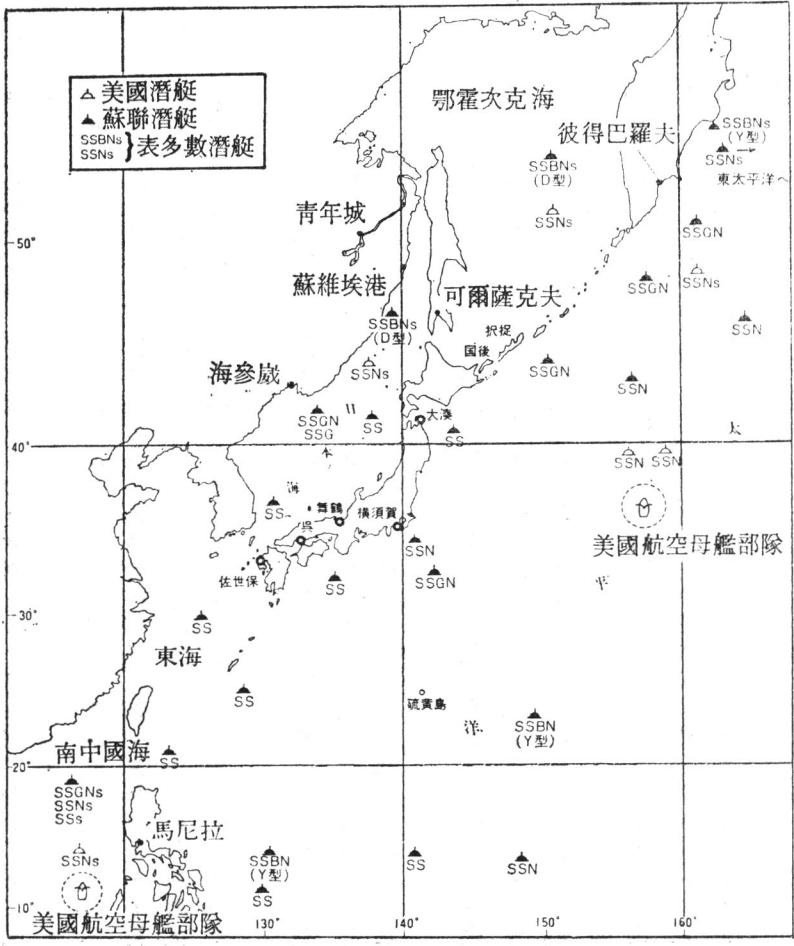
茲再分述如下：

(一)蘇聯勢力之東向太平洋與南下印度洋，隨其對阿富汗之佔領與太平洋艦隊之興起，已成為不爭之事實。蘇聯對西伯利亞的積極開發，鄂霍次克海防護工作的加強，北韓羅津港與越南金蘭灣的利用，已使蘇聯在太平洋西側的力量遽增；SS 25 飛彈之部署，更表示蘇聯對亞洲太平洋之重視（詳附圖）。

(二)日本勢力南下的加強。南進原為日本的傳統國策，遠之如明中葉後之所謂「倭寇」，近之如清同治十三年西鄉從道之「征臺」，以及以後發生之中日甲午戰爭，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等。本年九月日本政府已表示從明年起的五年內將大幅增加陸海空三個自衛隊機艦及飛彈的配備，以提高日本的自主防守能力，防衛一、〇〇〇哩的海線安全；亦即從日本海線向南延伸到關島及菲律賓賓以西，都將成為日本的海上防衛圈。

(三)中共勢力向太平洋發展的快速，可以從中共數次向太平洋發射飛彈看出。不論是濱海油田的探採，或是沿海經濟特區的設置，都使中共勢力有向太平洋加快伸展的必要。在中國歷史傳統上，文化經濟重心自三代

美蘇兩國潛艇在西北太平洋上展開的情形（戰爭狀態）



秦漢迄今有逐漸東南移的明顯傾向，現在已經移到太平洋。中共「四化」工作苟欲有所成就，更非開放門戶，並向海洋發展不可。臺灣在這一脈絡上實居於中共政權成敗關鍵的樞紐地位。

(四)美國勢力西移可能性的加大。由於菲律賓政治之不穩定與經濟秩序的紊亂，造成美國在菲海空蘇比克灣與克拉克基地的不安全，美國若一旦撤出其在菲基地而退至塞班島，則更不能制衡蘇聯太平洋艦隊在南中國海的力量。假如蘇聯一旦能夠利用臺灣的海空基地，則美國在太平洋的勢力將更無法與之抗衡。八〇年代中期以還，美國似已逐漸悟出南海之重要性，為了對付蘇聯太平洋艦隊的挑戰，美國西進的可能性亦已提高，這可能在中共的默許下進行。是以八〇年代中期以後，我國在這一脈絡上的戰略地位，較之以前將可能提昇許多。

(五)南太平洋澳洲的北進加深。澳洲與東協在八〇年代初期關係即已不斷加強，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將可預見澳洲與東北亞關係的加深。在歷次海線交通安全研討會上，澳洲代表的表現最為一貫而積極，予人以深刻印象。澳洲憂慮蘇聯太平洋艦隊的南下而須未雨綢繆。雖然 ANZUS (美澳紐聯防公約) 與五國協定目下仍為澳洲安全的骨幹，但澳洲積極加強其與東北亞的關係可能是其前進部署 (forward deployment) 戰略構想的外交體現。

(六)南中國海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東協作為一個自主防衛體系在國際政治上的比重不斷增加；蘇聯對越南金蘭灣的利用及其新武器的巨幅發展，使其太平洋艦隊的威力大增。美國受到蘇聯的挑戰，作出了有力回應，便是發展其大海軍主義；而美國對太平洋盆地的貿易量超過其對歐市貿易量的總和，且正不斷加大，是以維持太平洋盆地的海線交通安全，逐漸成了美國的國策。在此節骨眼上，我國戰略地位在八〇年代中期的美國人心目中將巨幅增長。

為了因應八〇年代中期以後我國戰略地位的提高並釐定新的戰略態勢，我們必須體認下列諸點，並擇要促其實現：(1) 制定南海盆地計劃與東協各國加強合作；(2) 發展大海軍主義 (Oceanism) 與大海軍主義 (Navalism)；(3) 研究太平洋盆地海線交通安全計劃，積極展開海洋外交；(4) 設立海洋國際問題研究所；(5) 除東北亞方面中、日、韓命運共同體的提倡外，應將目光南移到東南亞，提倡港、臺、新經濟文化共同體，進而擴及東協六國。

李登科先生：我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

(一)、西太平洋與美國的經濟及安全關係日益密切

(1) 從經濟方面來看，1. 美國與西太平洋 (東亞) 地區的貿易已經佔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而且將繼續成長；2. 西太平洋地區中的日本、大韓民國、中華民國、新加坡、印尼等國都是美國重要的貿易伙伴。

(2) 從安全方面來看：1. 美國目前仍維持八個雙邊安全條約，其中有五個是與西太平洋的國家有關；2. 美蘇兩國在此一地區的戰略對峙趨明顯，蘇聯在此區域的軍事擴張已讓美國感到十分焦慮。

(二)、我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

(1) 居於世界三條重要海運貿易路線的樞紐地帶。臺灣海峽及巴士海峽是世界三條重要海運貿易路線的必經之地，這三條海線是：1. 美國——大西洋——遠東路線，溝通美國的濱大西洋港口、日本、中華民國、菲律賓及泰國；2. 美國——墨西哥灣——遠東路線，溝通美國濱墨西哥灣港口，經該灣、加勒比海、日本、中華民國、菲律賓、亞洲大陸及泰國；3. 美國——太平洋遠東路線，溝通美國濱太平洋港口、日本、中華民國、菲律賓、亞洲大陸與泰國。

(2) 扼控日、韓等國從中東輸入石油的航線。日本的石油需求有百分之六十五來自中東，韓國更高達百分之七十五。另外，日、韓兩國經東南亞進口的石油亦運經臺澎地區之水域。

(3) 中華民國與菲律賓是監視蘇聯在南中國海軍軍事活動的最佳地點。在菲律賓面臨政治與社會不安的情況下，中華民國的地位更見突出。

(4) 美國在增援東北亞的美軍或在東南亞進行軍事行動時，臺澎地區的水域與空域是美國運補路線的捷徑所在。

(5) 中華民國成功的發展模式是自由世界的一項重要資產。

(三)、我國應如何強化與西太平洋各民主國家的各項關係

(1) 經濟方面：鼓勵國人到東南亞投資設廠，利用當地原料。

(2) 文化交流方面：籌備學術研討會，鼓勵國人前往友我國家觀光，增進民間藝術交流。

(3) 安全方面：交換有關恐怖團體與活動之情報，共同消滅海盜，並進行國防科技合作等。

以上是個人的一點心得報告，提出來就教於各位專家。另外，想請教張隆義先生，可否具體說明一下，就目前情況而言，我們應該朝那些方向去努力，以便改善目前中日關係。

張隆義先生：

在對日關係上，我們處於比較不利的地位，要改善目前的關係，打破目前的局面，頗不容易，不過有幾點可以作為我們努力的方向：

(一) 長期有計畫地培訓研究日本的專家及對日交涉的人才。

(二) 成立日本問題研究中心，廣泛收集有關日本的資料，並分組進行研究，擬定對策，作為政府的諮詢機關及民間企業或團體的顧問。

(三) 加強對日廣播，使日本大眾能夠獲知中華民國的真實情況，進而支持中華民國，以彌補日本新聞界故意抹殺臺灣消息的偏頗現象。

(四)加強文化交流活動，鼓勵日本學生來華留學，邀請日本文化界、藝術界、體育界等來華表演或訪問，並要求相對平等措施，擴大彼此的交流與接觸面。

金家鎮先生：

當前我國實際行使主權的地區，除臺灣外，尚有位於臺灣海峽東南端之澎湖列島，海峽西北端鄰近大陸之金門與馬祖島群，以及若干南中國海上之小島。這些島嶼雖然面積不大，但其地理位置在西太平洋的防衛上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價值。因為這些島嶼正處於東南亞與東北亞的交會點，經我國三十餘年之經營，島上有設備完善的陸、海、空軍及各種後勤基地，可以西控臺灣海峽，南控巴士海峽，而該兩海峽又正是南中國海的北方咽喉，是太平洋經南中國海往印度洋船隻所必經的航線，更是西太平洋上的戰略要衝。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發動「南方作戰」，就是利用臺灣作為軍事基地，不到五個月就囊括了整個東南亞。臺灣與東南亞各國在戰略地理上的密切關係，由此可以想見。

就當前西太平洋的戰略情勢來說，我國所處的地理位置與美國、中共、蘇聯以及日本的防攻戰略，都具有密切的利害關係。(一)就美國而言：美國對我國的戰略觀點，可引用前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瓊斯於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參院外交委員會審查「臺灣關係法」安全條款時與斐西參議員的一段對話來加以說明。當時瓊斯報告說：「……如果我們能在將來對臺灣問題採用適當的行動，我相信將對美國和太平洋區的人民都有裨益。」斐西插問：「對不起，你的意思『如果我們』什麼？」瓊斯回答：「如果我們用行動來使人相信，美國對太平洋區仍感興趣，美軍仍留駐太平洋區，而且，美國關切臺灣人民的安全，那麼我深信對美國和太平洋區都有裨益。」斐西問：「你能否向我們說明，中共攻擊臺灣，是否會對我們的安全利益構成威脅，或只是我們必須嚴重關切的問題？」瓊斯回答：「我認為對臺灣的攻擊，不僅是我們嚴重關切之事，而且，會影響我們的安全利益，對此無可置疑。」我國在美國心目中的戰略地位，從這段問答中可以思過半矣。

美國與我國關係良好，我國仍為美國西太平洋上鏈島防線的一環，也是美中（共）關係中制衡中共的一張王牌，相信這也就是中共一再聲稱：「臺灣問題是中（共）美關係的最大障礙」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中美關係良好，也可確保美國第七艦隊和蘇聯太平洋艦隊在西太平洋上處於戰略平衡的地位，使得美國第七艦隊的橫須賀至蘇比克灣航線與美國的東亞海運線保持暢通。(二)就蘇聯而言：我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對於蘇聯，極具誘惑力，假設蘇聯能利用臺灣的海空軍基地，則它對中共的包圍便告完成，對於中蘇共的關係可能有重大的影響；同時，蘇聯的太平洋艦隊也就處於主宰美國第七艦隊的橫須賀至蘇比克灣軸線和美國東亞航線的戰略地位。對日本、南韓而言，其國防生命線也落入蘇聯的掌握之中。屆時西太平洋的國際關係必將發生重大的變化。

(三)對中共而言：一旦取得臺灣，不僅它在政治上完成了統一大業，其海空軍軍事基地也可離開大陸，向前推進一大步。屆時

臺灣將真正成為它在西太平洋上的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其海空軍非但可以隨時進出太平洋，且更增添了一處優良的潛艇基地。在戰略上突破了蘇聯的包圍，也控制了太平洋進入南中國海的北方瓶頸，掌握了日本、南韓的國防生命線。此外，東南亞各國均將在其勢力範圍之內，甚至紐、澳、南太平洋若干島嶼國家亦將受其威脅。

(四)對日本而言：西太平洋現存之戰略形勢，對日本最為有利，非但其南方戰略側翼安全無虞，且可利用美、蘇、中共在亞洲相峙的戰略關係，爭取時間發展經濟與科技，充實國力。假設臺灣為中共所併吞或為蘇聯所利用，則日本所處的有利態勢將立即發生重大變化，西太平洋的國際關係亦將隨之改觀。

張和蘊先生：我國與澳洲及紐西蘭之關係

(一)中澳關係

當澳洲自由黨總理孟齊斯、荷特、高登及麥馬洪執政時期（一九四九～七二），中澳關係頗為友好。孟齊斯並未尾隨英國承認中共的路線，而僅承認中華民國為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其後數位總理都遵循孟氏的政策，與我國保持並增進友好關係。但是，澳洲工黨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大選中獲勝，其總理惠特蘭於上臺後不久即與中共「建交」，而使友好的中澳外交關係為之中止。我國乃於一九七三年六月在澳洲墨爾本設立「遠東貿易公司」(Far East Trading Company Pty. Ltd.)，以維持中澳的實質關係。

其後，經中澳有關人士的努力推動，兩國雙邊貿易和民間友誼有增無減。我國和澳洲的貿易總額，一九七五年約三億餘美元，至一九八四年已達十六億零九百萬美元，十年之內約增長了五倍之多。

澳洲友人戴貝(Douglas Darby)支持我國最力。他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結合志同道合的澳洲人士，在雪梨成立了「澳中協會」(Australia-Free China Society, AECS)，其宗旨在支持中華民國維護自由正義的原則，並為會員介紹中華民國的進步實況，提供有關經濟、商業及觀光方面的資料。「澳中協會」接著於次（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成立了臺北辦事處，以辦理該協會有關業務。

近幾年來，中澳民間各階層人士交互訪問，文化體育團體也經常交流，使兩國的來往日趨密切。「澳洲全國總商會」(The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CC)鑒於中澳實質關係的迅速發展，乃於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在華成立「澳洲商工辦事處」(The Australian Office of Commerce)，並派貿易代表馬廷策(William Matingly)負責主持。這是中澳斷交後，澳洲首次在華成立的一個半官方機構，以推動彼此的經貿關係。

(二)中紐關係

我國和紐西蘭的關係，在紐西蘭國民黨總理馬紹爾與荷里沃克等人執政時期（一九四九～五七，一九六〇～七二）非常友好

。當時紐西蘭在許多國際政治場合均支持我國的立場，兩國官方及民間的交往也很密切。但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紐工黨柯克政府宣佈與中共「建交」，遂使一向敦睦的中紐外交關係為之中止。我國為著維持兩國的實質關係，乃於一九七三年五月在紐國奧克蘭設立「亞東貿易中心」(East Asia Trade Center)，該中心已於一九八一年遷至紐京威靈頓。中紐貿易與年遞增，雙邊貿易總額已由一九七五年的二千九百餘萬美元，增為一九八四年的一億六千萬美元，十年之間，約增加了五倍。近幾年來，紐國政府當局已將中紐接觸的限制略為放寬，而使兩國的來往較前增加。

(三)我與澳、紐關係需要更上層樓

我國與澳、紐的實質關係雖然已見改善，但為著雙方的長遠友誼和利益，我們需要研究，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求得進一步的發展：(1)經貿方面。澳、紐為已開發國家，兩國當政者常將經濟問題和對外貿易列為施政的第一優先，甚至說，其外交政策就是貿易。我國應增加對其農礦產品的採購，同時我們要提高輸往澳、紐的工業製成品的品質，他們對我國的貨品亦應放寬限額和降低關稅，以利雙邊貿易的增長；(2)澳、紐為著名的體育王國，他們除熱愛板球之外，也喜愛橄欖球、網球和游泳等運動，我國體育界應和澳、紐時常互相邀訪，參加各項比賽；(3)學術文化方面。澳、紐立國雖短，但他們承襲英國的傳統，重視學術文化。我國應和他們定期舉行各類學術會議，增加學人與留學生的交換，以及文化團體的互訪演出。

更重要的，我中華民國臺灣和澳、紐同處於西太平洋鏈島防線之上，有著共同的戰略利益。我國要勸告澳、紐放棄對中共的幻想，並加強和中華民國及其他亞太自由國家的關係，以確保西太平洋的和平與安全。

八、主席結論：

今天的座談會非常成功，不但引言人的報告簡單扼要，各位專家教授的指教也很有價值。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基於本國利益的考慮，至於如何去執行，往往受到當時國際情勢所牽制。今天我國的處境正是如此。

從宋先生有關日本的發言來看，我國與日本的關係，除了在貿易上一些小幅度的改善之外，將不會有什麼大的改變。誠如朱松柏先生所言，南韓早就希望與中共進一步交往，其所以尚未如願，是因為北平仍有顧慮。今天比較值得國人憂慮的是菲律賓的局勢。菲國一旦發生變故，將對中華民國產生重大的影響，其程度甚至超過日韓。

近鄰與我國的外交關係異常重要。以日本為例，一九七二年，中日斷交之時所設立之亞東關係協會，為一九七八年中美斷交時創下了先例，因此，美國也成立了類似機構——美國在臺協會——處理兩國事務。又一九七五年菲律賓、泰國相繼與我國斷交。等到一九七八年中美斷交時，美國就曾提到我們的近鄰都紛紛與我國斷交，而美國等到一九七八年才如此作，已經算是仁至義盡了。因此，如何加強與近鄰國家的關係特別重要。

今天的座談會就此結束，個人謹代表中心感謝各位專家教授的蒞臨指教。